

澳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地緣功能： 以馬來西亞為例

蔡怡竑 王建偉

[摘要] 無論從地緣區位或是歷史文化發展來看，東南亞都是澳門的“老鄰居”。當前，東南亞各國快速發展，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都出現截然不同的面貌。此現象更與澳門未來發展息息相關。20世紀80、90年代，不少來自東南亞的僑民移居澳門，並融入今日的澳門社會。其次，東南亞的物資與澳門市民的生活是直接掛鉤的，突顯澳門與東南亞國家在經濟地緣上的重要性。從理論上講，克魯曼的新地理經濟學與“一帶一路”的結合，可以完整地詮釋澳門與東南亞國家之間存在的共同紐帶與未來合作的方向。馬來西亞是“一帶一路”的重點國家，同時也是中國、美國與日本三國積極拉攏的夥伴國家。馬來西亞近年的外來直接投資有顯著增長，尤其是在中國的“一帶一路”框架下的投資集中在港口、鐵路、發電站等戰略性基礎設施項目上。本文旨在探討澳門在推動馬來西亞參與“一帶一路”過程中可發揮的戰略角色，包括如何發揮澳門獨特的區位條件及地緣優勢，通過有意義融入國家“帶路”建設，推動澳門經濟轉型而適度多元的發展，從而實現國家和澳門利益的雙贏。

[關鍵詞] 一帶一路 澳門 馬來西亞 新地理經濟學 可持續發展

一、從歷史視角到區域發展

英國學者Strange指出傳統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學一直是相互關聯的，但有些歷史情況特別有利於應用經濟槓桿和治國方略。^① 地緣文化(geo-culture)通過直接和間接的方式對地緣經濟關係發生作用，間接影響遠大於直接影響。從歷史與地緣文化視角來看，不少旅居東南亞國家的華僑都與閩粵籍貫有着密切關係。香港、澳門與海外華人的互動更為深化，不僅在東南亞地區的地緣經濟合作中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是推動文化貿易的有力槓桿。澳門的海洋文化具有外向性、開放性和商品性的特徵。而“一帶一路”的框架，可以讓澳門重新認識東南亞國家。位處嶺南地區的澳門，同時也是中國海洋文化的發祥地，古百越人是典型的海洋民族；嶺南地區的海洋文化積澱，對廣東地區的改革開放、發展貿易等有着重要的影響。北回歸線以南珠江流域及兩廣沿海的廣府文化，具有

作者簡介：蔡怡竑，澳門城市大學高級講師、國際關係博士；王建偉，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全球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所長、思路智庫理事。

① Susan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4.

鮮明的商業性和向海外拓殖性，以“海上絲綢之路”為主要途徑，構築了中外關係史的重要篇章。^① 澳門開埠以後，通過海洋走向世界，接納來自五洲四海的文化，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對外開放的澳門因此成為西方文化進入中國的橋樑。西方文化通過澳門湧入國內，直接推動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澳門作為國際貿易港口，商人皆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當時的澳葡政府為了留住這些外埠的商人，就以尊重外國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習俗作為治理城市的方針；這一傳統延續至今，也就自然成為澳門社會融合的基礎之一。澳門海洋文化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休閒娛樂。澳門特區政府為了發展被稱為“東方蒙地卡羅”的特色文化，^② 除了博彩業外，也積極開拓澳門的旅遊資源，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旅遊產品，藉此發展澳門的以休閒娛樂文化為特徵的經濟。

Cowen 和 Smith 提出通過“地緣經濟”(geo-economics)的空間、權力和安全概念挑戰着國際體系的本質；針對地緣政治的形式也被市場邏輯重新調整，地緣經濟學之“要角”不易被地緣政治之算計所取代，尤其是當鄰國或區域國家已經形成更密切的互賴關係的時候。^③ Luttwak 進一步詮釋了瞭解當代國際關係的關鍵就在於掌握地緣經濟競爭；這種競爭不僅體現在國家角色現時佔有的權重，也是政治精英具有基於其國家自身利益與指導思想的重塑能力。^④ 正如 Jiang 所得出的結論，中國憑藉過去三十年的改革經驗以及在工業化方面取得的進展，為發展中國家例如非洲如何消除貧困提供典範和經驗，並因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深具信心。^⑤

在地緣政治上，澳門並不如隔鄰的香港在東西方政治和外交博弈中扮演和發揮着顯著的角色和功能；但是相對而言，澳門卻在地緣經濟上有其“存在”及發展的意義。論地緣經濟功能，澳門可以與一些東盟國家構建網絡發展結構和互補關係，既能保持穩定經濟發展，分享經濟利益，也可以協調政治和經濟關係。澳門的博彩業與旅遊業聚集現象如能與周邊地區緊密整合就會產出溢出效應，為澳門產業多元化發展注入新的驅動力量，優化澳門在地的產業結構。透過貿易理論與區位產業分工，澳門博彩與旅遊業在消費高端上是佔有絕對優勢，且依附於中端的勞動力及產品生產鏈的支持。因此，上述理據不僅支持澳門博彩產業在地經濟可持續發展，亦說明國際貿易與區位因素可以提供澳門產業升級與結構優化的機遇。

與此同時，澳門亦着手探討促進馬來西亞與澳門的旅遊、文化、商務等交流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並加強推動澳門與馬來西亞在各領域的合作。本文認為要以地緣經濟的視角，即經濟因素(economic factors)、地緣區位(geo-location)及地緣文化(geo-culture)，將澳門與“一帶一路”視作利益共同體，進一步探討澳門的地緣功能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

① 黃鴻釗：《澳門海洋文化的若干問題》，《一個兩制研究》（澳門）2011年總第7期，第164—169頁。

② 澳門是中西特色並存的歐式小城，蘊藏着豐富的文化意涵，加上後期賭場自由化，慢慢變成奢華的賭城，猶如身處摩納哥的蒙地卡羅，澳門因此被冠以東方的“蒙地卡羅”。

③ Deborah Cowen, Neil Smith, “After Geopolitics? From The Geopolitical Social to Geoeconomics,” *Antipode*, Vol. 41, Issue 1 (2009), pp. 22-48.

④ Edward Luttwak, “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 Center for National Interest, 1990, pp. 17-23.

⑤ Wenran Jiang, “Fuelling the Dragon: China’s Rise and Its Energy and Resources Extraction in Afric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99, No. 1 (2009), pp. 585-609.

二、“一帶一路”與國際形勢：澳門的需求

全球化發展至今，已經在澳門與區域國家之間促成相互依賴的關係，尤其是產業發展與市場。澳門的經濟戰略須服從地緣政治特質：海洋經濟是與全球進行貿易，拓展全球市場，生命線就是透過無遠弗界的海洋聯繫，來維持經濟的發展。隨着經濟全球化往多極體系發展，中央政府於2014年積極推動“一帶一路”，進一步向歐亞大陸及印度洋拓展國家地緣經濟的佈局，推動中國與沿線國家的雙向開放經濟發展。同時，亞太地區國家持續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如TPP與RCEP），而“邊緣化”（marginalization）成了澳門作為微型海洋經濟體面臨的挑戰。

此外，澳門作為一個中國與葡語系國家之間的窗口或平台，實際上發揮的效果是可以預期的。葡語系市場與國際合作是有利澳門發揮優勢的條件，但這並非全然的優勢與主要的發展路線。以現實主義的基礎推估，葡語系國家與澳門之間在地理區域上，經濟發展程度及其他合作條件都不及澳門在亞太地區的經貿連結與整合來得重要。“一帶一路”是以中國作為歐亞大陸地緣經濟延伸的戰略佈局。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主要國家地緣距離以及與中國企業“走出去”區位選擇的關係是直接的，對於澳門亦是如此。劉曉鳳等人認為對沿線投資應以國家距離為參考，找準投資着力點，並積極縮小地緣距離，以節約投資成本，克服投資阻力；雖然東南亞的地緣政治也存在着一定的不穩定變數，例如政治風險以及經濟風險。^①

澳門整體發展在受到本地經濟特性的限制下，除了創新調整結構、強化經濟體質與產業競爭力外，澳門須更為積極和策略性地與新興市場進行產業互補，一方面合理分散集中大灣區的投資份額，同時增加澳門新興的中產階級在需求商機與區域國家的共同合作開發，進一步提高自身價值，成為其他國家進入亞洲的重要合作對象。

澳門位處東亞地緣經濟帶上，區域形勢的轉變是澳門面臨的挑戰，亦是機遇。從戰略發展的思維出發，作為微型經濟體的澳門必須優先處理澳門在亞太區域與市場戰略中的定位。在“一帶一路”的戰略架構中，澳門的地緣經濟角色是值得開掘的。同時，為澳門創造了難得的保護傘，維繫澳門與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功能，以更開放的態度融入國際經濟圈的契機。因此，澳門在選擇地緣合作國家之際，必然得優先考量符合澳門經濟文化發展條件的國家作為“一帶一路”的重要支點。再加上澳門若能獲得中央政府的支持參照香港加入“東盟加一”自由貿易區，就可融入“一帶一路”經濟帶發展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進程，其地緣經濟效能不言而喻。

三、地緣經濟作用：“一帶一路”上的澳門與馬來西亞

澳門在中央政府推動的“一帶一路”下享受搭便車（free-riding）的優惠，尤其是可以加強與地緣相接的東南亞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呼應中央政府提出開展對“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城市的研究，探討與研究澳門與馬六甲海峽之間的淵源，包括社會文化交流與經濟貿易合作，或能創造新的契機。

^① 劉曉鳳、葛岳靜、趙亞博：《國家距離與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投資區位選擇》，《經濟地理》（長沙）2017年第11期，第99—108頁。

馬來西亞是“一帶一路”的重點國家，在政治、經濟與文化方面都與中國保持密切的戰略夥伴關係。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中，馬來西亞扮演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角色都是關鍵的。馬來西亞位處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重要通道——馬六甲海峽，是中國國家利益之所在，也是世界樞紐的關鍵扼喉，適合作為走向地區政治經濟發展的大平台。再考量地緣政治與風險等因素，馬來西亞是備受英聯邦國家與回教世界認可的國家，皆在地緣政治、跨國投資與文化交流中扮演積極仲介角色與平台效用。歷史上，澳門與馬來西亞是同屬海洋經濟文化的大環境開埠。因此，澳門與馬來西亞兩地若能藉由“一帶一路”拓展合作平台，充分發揮地緣經濟的功能，不僅有利於加強中馬關係，同時也創造三贏成效（中央政府、馬來西亞及澳門），通過善用地緣而謀澳門可持續發展的新道路。

（一）經濟因素：海外投資與產業多元化

Wang 等人認為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地緣經濟主要是受地緣區位、地緣政治以及地緣文化所驅動。^① 其中，對地緣經濟構成的經濟因素主要是透過市場、產業政策、技術、網絡以及利益分享措施而形成的。Hayakawa 等人認為國家風險是一個綜合概念，不僅涉及政治風險，而且涉及到財務風險。而政治風險是指投資回報可能因制度質量低下和政治不穩定而受到影響。^② Krugman 認為考慮成品、原材料運輸過程中的冰山成本是要發揮自身的內生作用，^③ 融入歷史與預期因素，並在循環積累路徑依賴基礎上考慮擴散效應，進行生產選址及生產地址變遷。^④

Claver 等學者對於國際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分析形成不同的理論和流派，認為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主要有：東道國稅收政策、市場規模、經濟水平、自然資源稟賦、生產成本等。^⑤ Solomon 的實證結果顯示外來直接投資在國際間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猶如貿易一樣的跨境經濟互動。^⑥ Dunning 提出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指出企業存在下列三項優勢時，將會引發對外投資的動機，包括：基於其所具有的專屬優勢、尋求具區位優勢的

① Shufang Wang, Xiao Xue, Axing Zhu, Yuejing Ge, “The Key Driving Forces for Geo-Econom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Sustainability*, Vol. 9, Issue 12 (2017), pp. 1-20.

② Kazunobu Hayakawa, Fukunari Kimura, Hyun-Hoon LEE, “How Does Country Risk Matter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akarta: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2012.

③ 克魯德曼借用了薩繆爾遜（Paul Samuelson）在 1950 年代提出的“冰山運輸成本”（也稱“冰山貿易成本”）概念，假定商品的運輸成本是商品運輸量的一個比例，也就是假定商品抵達目的地的過程就像“冰山”的移動過程，過程中會“融化”掉一部分。簡言之，以用數理解析的方法嚴格討論“本地市場效應”，即在大市場中，企業集聚規模會超越市場擴大規模。由於規模收益遞增和運輸成本，商品集中於接近其大市場的地方生產會更有利可圖，一方面，集中在一個地方生產使規模經濟得以更好地實現，生產成本降低，另一方面，接近大市場使運輸成本降低，只有少量非本地產品才需要承擔較高的運輸成本。

④ Paul Krugman, “What’s New About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14, No. 2 (1998), pp. 7-17.

⑤ Diego Quer, Enrique Claver, Laura Rienda, “Political Risk, Cultural Distance,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Large Chinese Firm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29, Issue 4 (2012), pp. 1-16.

⑥ Solomon Polachek, Carlos Seiglie, Jun Xiang,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Vol. 18, Issue 5 (2007), pp. 415-429.

地區進行投資、依內部化的優勢決定其投資型態。^①其次，Kwon 和Konopa 曾以內部化理論觀點，對海外市場進入模式進行研究，其立論基礎是認為企業投入海外市場，必須面對較國內投資風險為高的文化差異、政治不穩定及匯率轉換等問題，故為使風險最小化，應選擇低資源之進入模式（例如出口）；然而當企業擁有國際知識與經驗，足以面對較高風險時，則會選擇高資源之進入模式（例如海外直接生產），以獲取較高利潤。^②

目前，“一帶一路”提供了融資產品與綠地投資（green-field investment）的機遇。^③截至2019年6月，澳門特區政府基本儲備有1,488億澳門元，超額儲備有4,002億澳門元。澳門特區政府善用社會與政府的財政資源為國家“一帶一路”做好投資佈局。因此，更需具體化如何運用澳門的財政優勢，將儲備持有資產形式走向更多元化的國際投資，包括綠地投資與合資開發。在充裕的財政儲備的條件下，澳門可藉“一帶一路”的新形勢積極走向國際，與中央政府與閩粵政府共同“走出去”進行海外投資佈局，同時發揮公共儲備在投資避險的穩健財務槓桿作用。政府可以透過產業發展政策，鼓勵民間投資由大灣區拓展到東南亞市場，針對策略性產業制定類似日本政府的“中國加一”的佈局，引導廠商投資馬來西亞的同時，也提出備援方案。

其次，澳門民間資金充裕，居民人均存款約91萬元澳門元（約11.3萬美元），^④位列高收入國的水平。Dunning 將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為六大類型：資源導向型、市場導向型、效率導向型、策略資產導向型、貿易流通型，以及支援性服務型。^⑤澳門私營部門受限於市場規模、產業支援以及欠善的經商環境，因此在策略資產導向型、貿易流通型，以及支援性服務型等方面有其發展的空間。“一帶一路”有利於澳門民間資金面向沿線國家進行投資，而非僅限於特區政府在公部門的投資活動。國際生產分工的移轉與投資活動的關係相當密切，從東亞國家外國直接投資（FDI）流入所呈現的變化軌道中，似乎可見在投資帶動貿易，以及外商將生產基地在地化等效應下，一個地區在產業國際分工中的位移。

（二）地緣區位：搭建“第三國轉口”與產業整合

Krugman 在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理論中用規模經濟與運輸成本的交互作用所發展出來的一個簡單的模型來說明製造業的地理聚集現象。^⑥接着，

① John H. Dunning, “Toward an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ome Empirical Tes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Vol. 11, Issue 1 (1980), pp. 9-31.

② Yung-Chul Kwon, Leonard J. Konopa, “Impact of Host Country Market Characteristics on the Choice of Foreign Market Entry Mode,”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Vol. 10, Issue 2 (1993), pp. 60-76.

③ 綠地投資又稱創建投資，是指跨國公司等投資主體在東道國境內依照東道國的法律設置的部分或全部資產所有權歸外國投資者所有的企業。創建投資會直接導致東道國生產能力、產出和就業的增長。綠地投資作為國際直接投資中獲得實物資產的重要方式是源遠流長的。綠地投資的好處：（一）有利於選擇符合跨國公司全球戰略目標的生產規模和投資區位。（二）投資者在較大程度上把握風險，在利潤分配上，營銷策略上，母公司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內部調整，這些都使新建企業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主動權。（三）創建新的企業不易受東道國法律和政策上的限制因為新建企業可以為當地帶來很多就業機會，並且增加稅收。

④ 澳門金管局最新發佈“2018年5月份貨幣及金融統計”。

⑤ John H. Dunn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England: Wokingham Addison Wesley Publisher, 1993.

⑥ Paul Krugman, “What’s New About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14, No. 2 (1998), pp. 7-17.

Krugman 又強調了要把社會、政治、文化以及體制的因素納入到主流的經濟模型之中，這是當下較為全面的理論觀點。Dunning 的國際折衷理論中強調的直接區位優勢（東道國的市場與政策優惠）與間接區位優勢（運輸成本），是海外投資的先決條件。而在“一帶一路”的架構下投資馬來西亞是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的，而且良好的“中馬關係”同時也可以為澳門提供投資契機。按照國際投資理論，地緣經濟的區位優勢主要體現在：政局穩定、基礎設施良好、技術和管理水平高、勞動力素質高、市場容量大、經濟一體化程度高、經濟自由度較大、法律制度完善等方面。

馬來西亞優越的區位位置及生產條件的確為澳門特區政府及私人企業帶來新的機遇。澳門在資金充裕的條件下，可以“走出去”拓展澳門在海外第一產業與第二產業的經濟發展。澳門在推動產業升級工程中，必須尋找一個適合的支撐體系，方能發揮互補與協調優勢。澳門可以打造成為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商務服務平台，可以利用地緣的有利條件，協助珠江三角洲尤其是粵西地區走向世界，把粵西地區的名優產品轉口到東南亞等地，粵西地區的企業也可以更好地利用澳門作為聯絡海外的橋樑和窗口。

近五年的商貿數據顯示，澳門與馬來西亞協作的轉運貿易有顯著成長，特別在2016年比前期增長近五倍（表1），後續亦呈快速增長態勢。加工與轉運站為澳門及馬來西亞創造經濟發展機會。轉口可以幫助企業解決反傾銷稅問題，通過第三國轉口物流，出具第三國產地證，便可享受優惠關稅政策。只需通過合法的途徑，經過第三方國家轉口便可重新獲得更大的市場。通過轉口方式出口受限產品時，貨物仍然在中國口岸發運，但不以直航方式直達目的港，而是選擇一個國際中轉港口，將直航變為：頭程由中國口岸發送貨櫃到中轉港，在中轉港完成換櫃重新發運，二程由中轉港到最終目的港。在換櫃的同時，完成第三國出口文件，用第三國原產地證書及相關配套出口文件作為國外進口商的清關文件。

表 1 2014—2018 年澳門與馬來西亞進出口與轉出口（單位：澳門元）

年份	進口	出口	本地出口	再出口	轉運	同期成長
2014	654,360,207	19,795,278	1,848,680	17,946,598	16,661,183	-47.63%
2015	645,685,006	64,805,034	1,266,158	63,538,876	31,814,862	90.95%
2016	561,804,088	10,616,685	1,377,346	9,239,339	188,366,745	492.07%
2017	572,221,373	7,961,877	1,192,708	6,769,169	292,930,687	55.51%
2018	673,391,544	12,156,798	844,090	11,312,708	550,795,851	188.03%

資料來源：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19年9月）。

2016年以來，已有企業借助澳門作為中國華南地區空運門戶的作用，將華南地區電子類產品空運到馬來西亞。再通過馬來西亞作為國際貿易平台轉口至其他東南亞國家，甚至延伸至中東一帶更遠的地區。同時，將馬來西亞國際空運業務透過澳門作為戰略延伸平台，輻射至中國華南地區，促進中國與馬來西亞及其周邊國家的貿易往來。其中，主要以電子設備等高附加值貨物為主，貨源主要集中在華南地區。藉着粵閩港澳的港口經濟發展的合作優勢，地方政府與特區政府共同推展亞洲市場，幫助提升澳門旅遊業的發展，並借重澳門作為自由港的地理及經濟優勢。

其次，澳門既要提升澳門自身的競爭力，也要透過區域合作與國家發展，尤其是與廣東和福建等兄弟省市的發展有機結合起來。時逢博彩稅（尤其是貴賓廳稅收）下降之際，稅收基礎的對象已開始集中在較低檔次的大廳博彩稅收。澳門可積極與以馬來西亞吉隆坡國際機場作為樞紐的亞洲航空（Air Asia）進行區域廉價航空市場的整合，藉由航權的整合與共享機制，加大服務較低消費客群來源的維度。再者，馬來西亞是強化澳門國際機場在區域市場的助力，與其共建東亞的廉價航空運輸網，可提供落地旅遊外，另可作為轉往東北亞地區的轉機航線。另外，旅遊局可推出相關旅遊配套，吸引更多遊客選擇1+1（即澳門+內地城市或日本等地）的旅遊配套，創造更多商機及空中運輸的整合。

為了維繫澳門海洋文化的永續發展，澳門特區政府當前應注重在休閒旅遊、港口運輸、海洋觀光等海洋相關服務業的開拓，致力改善港埠功能、強化觀光設施，以競逐海洋服務商機，而“一帶一路”的框架，可以讓澳門重新認識東南亞國家。在“一帶一路”的大趨勢下，亞太區域內的旅遊市場及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確實可以為澳門創造更多的國際經濟聯繫，尤其是由旅遊業帶動更多的國際航線的開發、誘發其他周邊產業如酒店業、零售業及會展業的擴展條件。澳門可與馬來西亞攜手合作，針對亞太區域的旅遊市場、勞動市場與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進行整合。馬來西亞在整體旅遊服務業方面有很成熟的網絡和豐富的經驗，有利於澳門與馬來西亞的合作，對澳門拓展旅客多元化有戰略性的意義，尤其是借助於馬來西亞在回教世界及區域的優勢來打開中東和印度兩大市場。

在“一帶一路”的發展戰略與規劃上，以澳門與馬來西亞共同塑造合作產業簇群的可行性是頗高的，尤其是第一產業與第二產業的區域供應鏈整合。其中，澳馬兩地政府、企業以及其他法人機構可以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對於兩地政府而言，主要去除有礙於產業簇群成長和升級的障礙，致力於吸引兩地資金進入產業簇群投資與產業簇群產品的外銷，這對澳門自身的經濟結構轉型是非常有利的。同時，兩地企業推動專業化的教育與培訓，加大研發投入鼓勵本地供應商的成立並吸取外資供應商，有利澳門在產業及企業轉型提供自我強化的功能（self-reinforcing）。對於相關協會或機構而言，協會機構則可致力於提供企業、政府各方交流、學習及問題解決的平台。總體而言，澳門與馬來西亞在互補的經濟關係上是可以期待更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一帶一路”的發展契機是一個撮合商機的大平台。

（三）地緣文化：僑界與專設機構“帶路”

地緣文化對地緣經濟關係的影響可起到至關重要的中介作用。Wang 等人的研究結果顯示，作為媒介變量，地理文化通過地理位置、經濟因素影響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① 地緣文化遵循“文化—理念—行為—合作”這樣的傳導路徑，在地緣經濟可持續發展中發揮着可傳播的作用。在澳門，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是支持澳門社會多元發展的主導力量，社團因此成了政府與民間互動的主要橋樑。澳門的文教組織對支持“一帶一路”的公民外交是顯著作用，且會積極的促進作用，有利澳門進一步進行海外投資及生產。其次，澳門特區政府更應積極善用閩籍澳商為澳門在“一帶一路”創造新起點。尤其是澳門民間社團在海外

^① Shufang Wang, Xiao Xue, Axing Zhu, Yuejing Ge, “The Key Driving Forces for Geo-Econom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Sustainability*, Vol. 9, Issue 12 (2017), pp. 1-20.

僑界擁有廣大的投資與人文交流平台。在海外投資的平台方面，濃厚社團社會的澳門比香港更有條件“走出去”。歸僑組織也是全球華商網絡的一個重要群體。他們除了關注本身正當權益，還積極參與社會事務，自覺地推動澳門與原僑居地的聯絡，並根據其自身的特點和優勢，積極開展活動，推進澳門的對外經濟文化關係。

澳門與東南亞國家的地緣利益關係在歷史上就曾經出現間歇性發展，唯實際的認知與結合地緣經濟的發展仍相當脆弱。對於馬來西亞的概念與形象仍有不少還是停留在過去的刻板印象或口述歷史。因此，澳門與馬來西亞兩地的交流大多由民間社團與商會展開，互動交流尚未“常態化”。直到2012年，澳門特區政府在馬來西亞的馬六甲設立了“澳門展館”，這是兩地政府首次正式的交流，搭建增加瞭解及鞏固友誼和合作的平台。^①在這方面，建議澳門特區政府須結合民間企業力量，針對與東盟之經貿往來，開辦專職負責與東盟國家的經貿交流與溝通，特別設立非政府組織（NGO）的專責對口單位如交流機構與相關研究辦公室，藉此推廣商務或者會議、參展等其他交流形式。

四、結論

澳門特區政府與民間應善用“一帶一路”的地緣經濟作用，將澳門在國際區域的邊緣化傾向由“被動”轉為“主動”。新地理經濟學理論與相關區域經濟理論，多闡明區位與文化對澳門在地緣經濟衍生的條件與功能。澳門與馬來西亞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所能發揮的地緣功效是可以預期的，對澳門經濟可持續發展、產業結構優化以及外經濟聯繫都有着積極的意義。澳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重要節點上，秉承澳門的獨特區位與人文優勢和面對的機遇和挑戰，特區政府與民間應加強政策聯通、促進項目參與，以及建立伙伴合作，以推動澳門、內地和“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及地區夥伴如馬來西亞的協作。

[責任編輯 陳超敏]

^① 澳門特別行政區新聞局：《馬六甲“澳門展館”隆重開幕》，2012年6月26日，https://mobile.gcs.gov.mo/pda_detail.php?PageLang=C&DataUcn=62074。